

整体现型认知风格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

——刻板印象的中介作用

牛梓宁

华中农业大学

摘要: 本研究对 458 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考察了中国高校学生的认知风格、刻板印象和跨文化敏感度的相互关系, 以期能够为跨文化教学提供理论参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整体现型认知风格对刻板印象和跨文化敏感度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刻板印象显著正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 刻板印象在整体现型认知风格和跨文化敏感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认知风格; 刻板印象; 跨文化敏感度; 中介作用

引言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 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日渐频繁, 对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国际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因此中国教育, 特别是外语教育, 应该尽快担负起培养跨文化国际人才的紧迫使命^[1]。跨文化敏感度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是指个体在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方面培养积极情绪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促进个体采取适当有效的行为^[2], 被认为属于跨文化能力中的情感层面^[3]。很多研究也证实了跨文化能力与跨文化敏感度之间的密切关系, 并且研究结果表明跨文化敏感度的提升可以促进跨文化能力的提升^[2,4-6]。认知风格 (cognitive style) 是个体的一种普遍特征, 能够塑造个体在各种层面上执行任务的方式^[7], 认知风格作为认知因素的一种, 会对跨文化敏感度产生影响^[8], 但对这种影响的机理还缺乏足够的研究。

刻板印象 (Stereotypes) 是指“人们根据国籍、职业、人格类型、角色等把人分成若干类, 并对每一类的人形成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 即把人进行社会分类”^[9]。而认知风格作为处理和加工信息的一种方式, 会影响个体刻板印象的塑造^[10]。本研究旨在探讨认知风格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 以及刻板印象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一、文献综述

(一) 认知风格与跨文化敏感度

在跨文化研究领域, 目前对于认知风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风格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认知风格的分析模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以整体一分析 (Holistic-Analytic) 风格维度为特征的模型和以言语—

表象 (Versal-Imagery) 认知风格维度为特征的模型, 整体一分析风格维度模型在实证研究中应用更多, 也是本研究采用的模型, 在该模型中, 偏向整体现型认知风格的个体处在连续体的场依赖、熟悉、聚合、齐平化、整体这一方向, 而偏向分析型认知风格的个体则与之相反, 处在连续体的另一方向^[11]。Yiu 和 Saner^[8] 在研究认知风格对跨国公司经理的管理效率的影响时, 发现场依赖个体对交际更加敏感, 更加关注情绪刺激, 并且在人际交往上更有能力。王娟^[9] 指出具有以不确定因素为取向的认知风格的个体, 能够结合新旧观念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信念体系, 希望了解自己和周围环境;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交际对方的行为可能会判断失误, 并做出相应地改变。刘军和黄世霞^[12] 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场依赖型认知风格与语际语用能力正向显著相关, 场独立型认知风格与之不具备显著相关性。

一些研究证明认知因素在个体跨文化敏感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Bennett 和 Hammer^[4] 研究跨文化敏感度的发展模型时, 指出该模型的核心观点为从民族中心主义到民族相对主义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个体会经历六个阶段, 分别是: 拒绝、防卫、最小化、接受、适应和整合。每一阶段的改变都伴随着个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认知和行为上的改变, 越是靠近种族相对主义, 就越能感知到文化差异, 就越能更好地处理跨文化背景下的各种事情。Chen^[2] 也提到认知层面上的跨文化意识是发展跨文化敏感度的基础, 个体认知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跨文化敏感度水平的差异。大量研究表明认知灵活性与跨文化敏感度有正向相关关系^[13-15]。对于认知风格与跨文化敏感度之间关系的实

作者简介: 牛梓宁 (1997—),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及理论语言学。

证研究目前还不多见,但认知风格作为认知因素的一种,其差异也可能会影响跨文化敏感度水平的高低。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个体更偏向场依赖,更关注事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16],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整体型认知风格能够正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

(二) 认知风格与刻板印象

大量研究表明,认知风格与刻板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均认为认知因素会影响刻板印象的形成。Taylor 和 Falcone^[17]曾提出刻板印象的形成可能涉及到认知过程以及情感表达过程; Hilton 和 Von Hippel^[18]则讨论了动机和情感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认知来影响刻板印象的;另外, Soboleva 和 Obdalova^[19]提出个体是基于“分类”这一认知过程来理解另一文化背景群体的行为举止的,而“分类”的根据则是对另一文化以及自身文化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对认知风格和刻板印象及其相关变量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一些研究显示场依赖个体更容易受到刻板印象激活效应的影响,场独立个体则几乎不受影响^[20]; Pennycook 等人^[21]发现分析型认知风格负向预测个体对宗教以及超自然现象(如鬼魂、灵性治疗等)的信仰,认为具有分析型认知风格的个体能够对这些固有信仰进行批判性思考,克服最初被大众接受的偏见,从而拒绝这些固有看法,因此他们认为分析型认知风格可以负向预测刻板印象。以上研究表明,刻板印象与认知风格存在一定的关系,并且偏向分析型认知风格的个体更不容易产生刻板印象,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整体型认知风格能够正向预测刻板印象。

(三) 刻板印象与跨文化敏感度

学者们普遍认为克服刻板印象是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经阶段。Holmes 和 O' Neill^[22]指出培养跨文化能力包括承认不情愿和恐惧、强调和质疑刻板印象、监测感受和情绪、克服困惑和应对复杂性的过程;另外,根据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个体在拒绝这一阶段,通常利用之前的固有刻板印象来看待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群体;只有打破之前固有的刻板印象,去了解国外文化,才能进入发展模式的下一阶段^[4]。不正确的刻板印象在跨文化交际中起负面作用。王娟^[9]提到如果个体固有持有不正确地刻板印象,就很有可能导致其对他人的交际意图和行为理解错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Peng^[23]则发现中国大学生对美国人和日本人持有不准确的刻板印象,并且认为这种刻板印象会影响他们与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跨文化交流。综上所述,刻板印象会对跨文化敏感度产生消极影响,据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3:刻板印象会负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

(四) 刻板印象的中介作用

许多研究发现刻板印象在认知因素和行为意图之间起中介作用。Lu、Wang、Zou 和 Pang^[24]发现中国大学生对自闭症障碍的了解越多,对这个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就越少,相应地与之相隔的社交距离就越短,因此他们认为消极刻板印象在中国大学生有关自闭症障碍的知识和与自闭症障碍群体之间的社交距离之间起中介作用;在 Gaunt^[25]以犹太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感知冲突和群际接触经历会对人体是否愿意进行群际交往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以人们对群体内和群体外的刻板印象和评价为中介的; Woelfer 和 Foroutan^[26]则发现多元抵制是通过增加刻板印象来预测负面群际关系的。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刻板印象在整体型认知风格和跨文化敏感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步骤

研究对象为湖北省武汉市某重点大学458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本科生264人占比57.6%,研究生194人占比42.4%。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0.6岁,最小的17岁,最大的26岁,其中男生占比30.8%,女生占比69.2%。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获取研究所需数据,并将问卷经由网络平台发放给学生。我们对第一次收集的问卷展开了前测,共计258份。前测问卷共包含66个题项,对问卷题项进行信效度检验之后,删除了因子载荷量小于0.6的题项以及整体-分析型认知风格量表中“对变化的感知”整个维度,最终确定调查问卷的47个题项。修改之后的调查问卷再次通过网络平台发放给学生。第二次共计收集213份问卷。学生填写问卷后会获得相应的报酬。两次问卷发放共收回471份问卷,删除答题时间过短以及选项相同的问卷后,最终获得458份有效数据。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研究对象的认知风格、刻板印象和跨文化敏感度,使用的都是效度信度结果检验的成熟量表,我们对这些量表进行了翻译与整理,并根据中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少数问卷题项进行了适当的修改。第二部分调查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专业领域以及英语水平,一共6个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形式,选项从1到7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或非常不符合)”到“非常同意(或非常符合)”。

认知风格采用由 Choi, Koo 和 Jong An^[10] 开发的整体 - 分析型认知风格量表来测量。该量表包括 24 个题项, 由 4 个维度构成, 分别是: 因果关系 (Causality)、对待矛盾的态度 (Attitude toward contradictions)、对变化的感知 (Perception of change) 和关注点 (Locus of attention)。经过因子分析之后, 删除了 4 个因子载荷量小于 0.6 的题项。删除之后我们对问卷内部维度进行了相关性检测, 发现“对变化的感知”整个维度和其他维度负相关或不相关, 这与 Cheek 和 Norem^[27] 以及 Brauch 和 Größler^[28] 的研究结果相似。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该维度主要是反向题, 而反向题与正向题不一定测试同一维度^[29]。综合考虑之后, 删除了该维度。最终, 测试认知风格的量表包括 16 个题项以及 3 个维度: 因果关系、对待矛盾的态度和关注点。这 3 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920、0.818、0.808, 表明删减后的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删减后量表的总体 KMO 值为 0.902,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 0.000,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题项都荷载到各自理论维度下且因子载荷量大于 0.6, 3 个维度累积解释 63.87% 的变异量, 表明删减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学生认知风格的最终分数取 3 个维度的平均值, 分数越高表明越倾向于整体型认知风格, 反之则倾向于分析型认知风格。

刻板印象采用由 Carter、Hall、Carney 和 Rosip^[16] 开发的测试刻板印象接受程度的量表来测量。该量表包括 12 个题项, 无子维度。经过因子分析之后, 删除了 6 个因子载荷量小于 0.6 的题项, 最终确定测试刻板印象接受程度的量表的 6 个题项。删减后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值为 0.840, 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删减后量表的 KMO 值为 0.857,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 0.000,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题项的因子载荷量大于 0.6, 累积解释 56.38% 的变异量, 表明删减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学生的分数越高表明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

跨文化敏感度采用由 Chen 和 Starosta^[30] 发展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来测量。该量表包括 24 个题项, 由 5 个维度构成, 分别是: 交际参与度 (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 异 认 同 感 (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交际信心 (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 (Interaction enjoyment) 和交际专注度 (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经过因子分析之后, 删除了 5 个因子载荷量小于 0.6 的题项, 最终确定测试跨文化敏感度的量表的 19 个题项。删减后量表的以上 5 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863、0.770、0.873、0.823、0.791, 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删减后量表的总体 KMO 值为 0.862,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为 0.000,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后题项都荷载到各自理论维度下且因子载荷量大于 0.6, 5 个维度累积解释 70.26% 的变异量, 表明删减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最终分数取 5 个维度的平均值, 分数越高表明跨文化敏感度水平越高。

(三) 数据分析

本研究利用 SPSS 20.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利用 SPSS 插件 Process 3.5 进行了回归分析来探究有关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三、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由表 1 可知, 整体型认知风格分别与刻板印象 ($r=0.643, p < 0.01$) 和跨文化敏感度 ($r=0.414, p < 0.01$) 正相关。刻板印象与跨文化敏感度 ($r=0.468, p < 0.01$) 正相关。

(二) 假设检验

由表 2 可知, 整体型认知风格对跨文化敏感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0.320, p < 0.001, 95\%CI [0.255, 0.384]$), 假设 1 得以验证。整体型认知风格对刻板印象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0.623, p < 0.001, 95\%CI [0.555, 0.691]$), 假设 2 得以验证。刻板印象对跨文化敏感度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eta=0.275, p < 0.001, 95\%CI [0.1912, 0.3584]$), 而假设 3 为刻板印象会负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 因此假设 3 没有得到支持。

由表 3 可知, 整体型认知风格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直接效应为 0.149, 整体型认知风格通过中介变量刻板印象对跨文化敏感度的间接效应为 0.171。由于加入中介变量后, 整体型认知风格对跨文化敏感度的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N=458$)

| | 均值 | 标准差 | 1 | 2 | 3 |
|------------|-------|-------|---------|---------|---|
| 1. 整体型认知风格 | 5.263 | 0.827 | 1 | | |
| 2. 刻板印象 | 5.226 | 0.8 | 0.643** | 1 | |
| 3. 跨文化敏感度 | 4.789 | 0.638 | 0.414** | 0.468** | 1 |

注: ** $p < 0.01$ (双尾)

表 2 主效应分析

| Hypotheses | coeff | se | t | p | LLCI | ULCI |
|------------|-------|-------|--------|---|-------|-------|
| H1:CS → IS | 0.320 | 0.033 | 9.715 | 0 | 0.255 | 0.384 |
| H2:CS → ST | 0.623 | 0.035 | 17.936 | 0 | 0.555 | 0.691 |
| H3:ST → IS | 0.275 | 0.043 | 6.462 | 0 | 0.191 | 0.358 |

注: CS=Cognitive Style(整体型认知风格); ST=Stereotypes(刻板印象); IS=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跨文化敏感度)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 | coeff | se | LLCI | ULCI |
|-----------------|-------|-------|-------|-------|
| H4:CS → ST → IS | 0.171 | 0.031 | 0.112 | 0.233 |
| 总效应 | 0.320 | 0.033 | 0.255 | 0.384 |
| 直接效应 | 0.149 | 0.041 | 0.068 | 0.230 |
| 间接效应 | 0.171 | 0.031 | 0.112 | 0.233 |

注: CS=Cognitive Style(整体型认知风格); ST=Stereotypes(刻板印象); IS=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跨文化敏感度)

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仍不包含零, 因此刻板印象在整体型认知风格与跨文化敏感度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假设 4 得以验证。图 1 是对这种中介作用的总结。

四、讨论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整体型认知风格能够正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 即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学生跨文化敏感度水平更高, 这证实了王娟^[9]的观点, 即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个体, 更能够促进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交际。这可能与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倾向于选择不同类型的交际策略有关。在交际过程中, 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学生倾向于采取基于“比较”的交际策略, 即借助于已知共有概念来解释新概念; 偏向分析型认知风格的学生则倾向于采取基于“描述”的交际策略, 即通过描述概念所指个体的具体特征来解释新概念^[7], 前者能够将信息清晰传达给对方并使对方快速理解, 后者则需要对方花费时间来匹配满足特征的个体, 相较而言, 使用基于“比较”策略的学生在与对方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可能更加顺畅。

本研究显示整体型认知风格能够正向预测刻板印象, 即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学生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 进一步证实了 Pennycook、Cheyne、Seli、Koehler

和 Fugelsang^[21] 的观点。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学生对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互动更关注^[10], 因此他们对人际关系可能更加敏感。Yeung 和 Kashima^[31] 发现亚裔澳大利亚人(整体上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为了在交际中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会更多交流一些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所以对人际关系更加敏感的学生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 可能更倾向于借助刻板印象, 以期对交际对方的行为做出正确的预测, 从而实现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 偏向整体型认知风格的学生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

本研究结果显示, 刻板印象正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 即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的学生, 跨文化敏感度水平相对较高。以前的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刻板印象会阻碍跨文化沟通, 要实现有效跨文化沟通, 必须打破固有的刻板印象, 并了解并接受国外文化^[22]。但是这些研究里面谈到的刻板印象往往是不正确的刻板印象, 王娟^[9] 和 Peng^[23] 的研究显示不正确的刻板印象会妨碍跨文化交流。实际上刻板印象并不一定是有功能失调的(dysfunctional), 而是像每一种社会认知一样, 被使用是有原因的^[32], 也就是说, 刻板印象可以有其积极意义, 因为它们简化了我们必须处理的环境中的社会信息和刺激的数量, 通过依赖刻板印象, 仅仅知道个人的群体成员身份就足以形成期望并做出行为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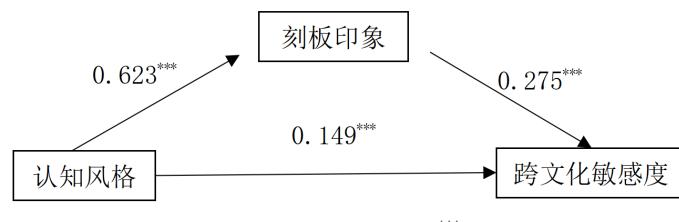


图 1 刻板印象的中介作用 (**p < 0.001)

测^[26]。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非常注重学生国外优秀文化的教育工作,学生也很愿意学习英语语言和文化,对于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形成了相对正确的刻板印象,这些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

本研究显示,刻板印象在整体型认知风格与跨文化敏感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认知风格影响的是对信息加工和处理的结果,跨文化敏感度则属于个体培养的一种能力。前者无法直接影响后者,两者之间应该有某些中介因素存在,本研究显示刻板印象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中介变量,即整体型认知风格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刻板印象的形成来提高跨文化敏感度的,所以应该加强学生国外文化的教育工作,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刻板印象,从而帮助学生实现有效跨文化沟通。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考察了中国高校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整体情况,分析了认知风格、刻板印象与跨文化敏感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刻板印象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整体型认知风格对刻板印象和跨文化敏感度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刻板印象显著正向预测跨文化敏感度;刻板印象在整体型认知风格和跨文化敏感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中研究对象均来自一所高校,未来的研究应该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与数量,确保研究结果普适性。第二、由于本研究为横向研究,所以研究结果中报告的认知风格、刻板印象与跨文化敏感度三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也许不能涵盖三者之间的所有关系,因此需要纵向研究来长期追踪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本研究所有的研究工具主要是自我报告的问卷,应该加上观察、访谈等质化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 [1] 孙有中.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J]. 中国外语 ,2016,13(3):1+17-22.
- [2] CHEN G-M.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Z]. the Biennial Convent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Hawaii. 1997.
- [3] 王宇. 维度与现状:跨文化能力情感层面研究 [J]. 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39-44.
- [4] BENNETT M J, HAMMER M.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4, 1(1): 1-12.
- [5] LEE OLSON C, KROEGER K R. Global competency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1, 5(2): 116-37.
- [6] 郭晓英. 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研究——基于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 [J]. 英语研究 ,2012,10(4):63-6+71.
- [7] LITTLEMORE J.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y[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 22(2): 241-65.
- [8] YIU L, SANER R. Determining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style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managers: Proposi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J].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0, 11(3): 319-24.
- [9] 王娟. 预测、解码与跨文化交际的变量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8):27-30.
- [10] CHOI I, KOO M, JONG AN C.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nalytic versus holistic thinking[J]. Pers Soc Psychol Bull, 2007, 33(5): 691-705.
- [11] 李浩然,刘海燕. 认知风格结构模型的发展 [J]. 心理学动态 ,2000(3):43-9.
- [12] 刘军,黄世霞. 场独立与依赖性认知风格与语际语用能力的相关性研究 [J]. 中国外语 ,2013,10(1):41-6.
- [13] CHRISTMAS C N, BARKER G G.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Differences in acculturatio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cognitive flexibility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 Latino immigra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4, 7(3): 238-57.
- [14] GANTT J. Broadening the lens: A pilot study of student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short-term study abroad experiences[D].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2014.
- [15] NAULY M, PURBA R M, FAUZIA R. Effectiveness of Harmony in Differences: increasing in universal difference orientation, sensitivity intercultural, thinking flexibility and prejudice;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ICOSOP 2017), F, 2017[C]. Atlantis Press.
- [16] CARTER J D, HALL J A, CARNEY D R, et 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acceptance of stereotyping[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6, 40(6): 1103-18.

[17] TAYLOR S E, FALCONE H-T. Cognitive bases of stereoty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egorization and prejudice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82, 8(3): 426-32.

[18] HILTON J L, VON HIPPEL W. Stereotypes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6, 47(1): 237-71.

[19] SOBOLEVA A V, OBDALOVA O A.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 cognitive style-inclusive approach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54: 155-61.

[20] 王沛, 吴薇. 自我效能感和认知风格对刻板印象激活效应的影响 [J]. *心理科学*, 2017, 40(1): 136-44.

[21] PENNYCOOK G, CHEYNE J A, SELI P, et al. Analytic cognitive style predicts religious and paranormal belief [J]. *Cognition*, 2012, 123(3): 335-46.

[22] HOLMES P, O' NEILL G. 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Ethnographies of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2, 36(5): 707-18.

[23] PENG S-Y. Impact of stereotypes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10, 11: 243-52.

[24] LU M, WANG R, ZOU Y, et al.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knowledg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and social distance from individuals with ASD: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stereotypes [J].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2022, 52(8): 3676-85.

[25] GAUNT R.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social contact on prejudi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ereotypes and evalua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1(6): 1340-55.

[26] WOELFER R, FOROUTAN N. Plurality resistance: Effects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ereotyp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22, 87: 42-50.

[27] CHEEK N N, NOREM J K. Holistic thinkers anchor less: Exploring the roles of self-construal and thinking styles in anchoring susceptibility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7, 115: 174-6.

[28] BRAUCH M, GRÖSSLER A.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thinking orient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bullwhip effect [J]. *System Dynamics Review*, 2022, 38(2): 121-34.

[29] DALAL D K, CARTER N T. Negatively worded items negatively impact survey research [M] // LANCE C E, VANDENBERG R J. *More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112-32.

[30] CHEN G-M, STAROSTA W J.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Z].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eattle, 2000.

[31] YEUNG V W L, KASHIMA Y. Culture and Stereotype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1, 43(3): 446-63.

[32] DEVINE P G.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6: 5-18.